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书海泛舟

古之贤者重家风

□ 王　杰

家教门风的根本意义在于传递德行品行，在于先人对后代人格的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家教门风，特别是对官员来讲，通过家教传递的德行将直接体现为为人为官的品性修养。

古代经典中有很多关于家教的案例，有亲为教诲的，也有先世语录或专门编成家训传之于世的。如孔子教子，曾子杀猪教子以及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等人的教子，还有颜氏家训、包拯家训、朱子家训等。这些案例成了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体现了美德的传递，并在社会上起到很大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古代名官对后代德行的重视。他们不仅在家训格言中简练概括了自己为人为官的价值追求与操守，还将其转化为对后人的期望，以维持崇高的家声。

《论语》中曾记载孔子对儿子孔鲤的一段教育。有一次孔鲤从庭院路过，碰到父亲站在那里，被叫住问：学诗了吗？孔鲤说，没有。孔子就说：不学诗，就不懂得说话。孔鲤就开始学诗。又一次，同样的场景，孔子问：学礼了吗？孔鲤说，没有。孔子就说：不学礼，就不懂得立身。在教育儿子时，孔子并不说太多的话，而是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将自己所看重的德行品行人格操守等通过“学诗”“学礼”传递下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言传身教，培养了后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使孔子家族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绵数千年而声名不落、礼法昭彰的家族。

孔子的弟子曾子，生性鲁钝，但极重视道德操守，自身行为不肯有一毫差错，他对后代的教育也是这样。有一次，曾子的妻子要出门一趟，为防幼子哭闹，就跟他说：等回来就杀猪给他吃。后来曾妻回来，曾子就要去杀猪，妻子阻拦说：那是跟孩子开玩笑的，不能当真。曾子说：跟小孩子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小孩没有知识，都是跟着父母学，听父母的教育。你现在欺骗他，是教给他欺骗。母亲欺骗孩子，孩子就不相信自己的母亲，这不是正确的教育啊。于是就杀猪煮了吃了。曾子杀猪教子，是为了告诉儿子以后要做一个讲诚信的人。现在有一些父母在教育小孩时不注意，随意许诺，但不兑现，口惠而实不至，久而久之，孩子就易形成惯于欺骗、说假话的习惯，这样的人如果为官，是很难以诚待人、秉公执法的。

孔子是圣人，曾子是贤人，他们对后代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人树立了榜样，特别是饱读圣贤书的士人官员们，略有志向者无不把门风家教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无不希望后人成为顶天立地、人格健全的君子。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就是诸葛亮的《诫子书》，短短八十余字，精练表达了自己所看重的价值追求和修身做人的方法。“静”“俭”“接世”，宁静简约并建立功业，这岂不就是诸葛亮自身的写照？诸葛亮青年的隐居修学，待时后举，茅庐朴素，不求闻达，不就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吗？后来经“三顾茅庐”，凭着忠心广才为蜀国立下汗马功劳，不就是“接世”之行，对“悲守穷庐”的反对吗？他以自身的德行训诫后人，希望后人能够以宁静淡泊修身修学，成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并建立功业的君子贤人，其中价值和方法的传递可说是古人家教的典范。

北宋显宦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望的一位贤臣，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清廉节俭，爱民如子，所到之处官声甚盛。范仲淹十分重视家风，他一生为官清廉，以俭持家，最看不惯奢侈浪费。在他儿子范纯仁结婚的时候，女方知其节俭，无其他要求，只是希望能使用罗绮作为幔帐，却被范仲淹一口否决，他说，绝对不能因此坏了家法，如果他们送来这样的幔帐，也一定要将它烧掉。但节俭并不意味着吝啬，而是把东西用在该用的地方。一次，范仲淹让范纯仁到外地给家里运麦子，范纯仁在途中遇到老朋友因无钱葬亲在外逗留，就将所有的麦子都给了他，回家后因这件事受到了父亲的表扬。可见，范仲淹是把对儿子品德的培养放在首位，他一共有四个儿子，分别是范纯佑、范纯仁、范纯礼和范纯粹，他们都延续节俭的家风、中正的品格，在为官之时以天下为己任，皆成名臣，这与范仲淹成功的家教有很大的关系。

《资治通鉴》的编纂者司马光也是北宋时期的一位重要官员，他一度做宰相，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颇有争议，但他一身行为不愧于君子之名，当代后世俱有所称。司马光与范仲淹一样，在“俭”字上要求很严，他严以律己，抵制奢侈铺张，看轻个人财物，以天下为己任，也将这一重要德风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司马康。

司马光曾为文《训俭示康》，专门强调俭的重要性。他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并且还分析了节俭和奢侈在人身上的作用。他教育司马康一定要从节俭做起，不然为人会有贪心，招致祸端，做官也一定不会清廉，走入贪赃枉法的道路。他还要求要把这个家训传承下去：“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可见司马光对子孙家教的何等重视。而司马康也秉承父亲教诲，为人节俭，做官清廉，史书上说他“为人廉洁，口不言财”，连皇帝所赐财物都不要，并评价他“济美象贤”，可说是很好地延传了司马家风。

北宋还有一位名臣包拯，他清峻正直，官声卓著，深得百姓爱戴，时至今日，各地仍有不少关于他的许多传说。包拯一生清廉节俭，处事公正严明，大公无私，不畏权贵，眼睛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甚至屡次顶撞皇帝。他平常言容庄肃，不苟言笑，对家人的要求也极为严格。他曾留下几十字的家训，深刻传达了他以自己为道德标杆对子孙后代的要求：“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对贪赃枉法之事深恶痛绝，绝对不能忍受后世子孙有如此作为者，乃至于将他们赶出家门，实在是十分严格的家教。时至今日，包氏子孙依然因有如此祖先而倍感光荣，因有如此家训而互相训诫，可谓官德之传，千百世矣。

用典释义

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

——摘自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 解　读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出自《荀子·大略》第二十七篇。原文为：“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不能而居之，诬也；无益而厚受之，窃也。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习近平在讲话中将原文中的“如学”化用为“为学”，这句话阐释了为官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儒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既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又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是战国末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据考证，《大略》是荀子的学生摘录和整理荀子的言论汇集而成，因为内容庞杂，涉及面广，“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也”。《大略》被誉为《荀子》中的“论语”。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是说有学问的人不一定都要去做官，但为官者必须要努力学习。此语令人想到中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其实“学而优则仕”出自荀子的祖师爷孔子的高足子夏之口，原话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但后世尤其是科举制出现之后，大多数中国人从功利主义出发，直接将其省略为“学而优则仕”，进而望文生义地将其曲解为“读书做官论”。其实这里的“优”，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优秀、好”的意思，而是“有余力”之意。所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应该是：“做官还有余力的人就可以去学习，学习有余力的人就可以去做官。”这句话是对孔子教育方针和办学目标的高度概括，体现了孔子强烈的入世精神。这里所谓的“学”，不是简单的知识学问，还有道德修养。在孔子看来，个人的学问修养是“出仕”的基础，因而，为官从政者，有精力和时间，就应该潜心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修养；而个人的知识学问及道德修养达到有余力的情况下，则可为官从政。

由此可见，荀子和孔子一样，强调的都是“学”是“仕”的前提和基础。为官从政不是为学的唯一目标，但是为官者却不能自以为达到了目的就停止“为学”，反而要继续学习、提高修养，方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如果才学不胜而享厚俸，则无异于行骗盗窃。

创建于1933年的中央党校，是培养中国共产党中高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以“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来勉励领导干部，很有深意。

在如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速度前所未有，不但“外行”很难领导内行，即使是“内行”也需要终身学习方可跟上时代步伐，如果仅满足于原有的知识积累，将很快被时代所淘汰。

这里，我们不能把“学习”狭义地理解为学习知识，而应该广义地理解为全面提高自身修养。因为一个人精神上的空虚，比知识的欠缺更加可怕，他在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负面诱惑时，将缺乏抵挡诱惑的定力。如果说个人的知识修养水平将影响其个人的前途命运，那么广大领导干部的知识修养水平将影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这也就是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时，将“学习型”放在首位的原因。

周一良学日语：大学者下“苦功”



□ 李卫民

大学者周一良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用功颇深，50年代以后由于任务多歧，研究涉及诸多方面，70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一良先生一生嗜书，并喜欢在书籍上题写感想，60余年的积累，经后人整理、汇编成书，以《周一良读书题记》为名行世。通读全书，老学者勤恳治学的情景，令人触动，他多年认真学习日语，不断购阅日语语言读物，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周先生在14岁时开始学习日语，他的父亲周叔弢先生先后聘请两位旅华日本人担任家庭教师，周一良先生的日文，不仅很快入门，而且开始攻读日本古典文学名著，1930年他进入燕京大学，选修日文课，周先生自承，这对他来说“是白拿学分的课程了”。由这样的表态，也可看出周先生的自信了。但是，通读《周一良读书题记》，周先生并未认定自己的日语已彻底过关，恰恰相反，他一直坚持日语学习，故此时常购买日语语言学习读物，并认真阅读、研究。

早在1927年，周先生就购阅一本日文原版俗语解释手册，他认为，这部书对于中国的日语学习者“读会话读本及阅小说”甚为有益，如果将书中内容熟读深记，更可掌握大量教科书中未曾涉及的日本的通俗生活用语。买到此书，周先生如获至宝，他还感叹，“惜近日我国习英语者尚无此一册也”。1987年12月，周先生又购买北京出版社刚刚推出的《日文书信大全》，1993年，他将此书通读一过，认为“颇有用也”。60余年间，周先生由初入学苑的新人已成为中外公认的学术权威，但是，对于日语语言学习，并未有所放松，诚心正意，苦下功夫，令人赞佩，也令人惊异，起点甚高的大学者，何至于此？

为何苦下功夫学习日语，周先生并未明确说出缘由。《傅雷家书》中的一个片段，似乎有助我们理解。1960年代初，傅雷正在翻译巴尔扎克的《幻灭》。他在信中告诉傅聪，在通读原著之后，感到其中生词不少，他将生词全部抄下，“共有一千一百余生字”，他定下计划，“发个狠每天温三百至四百生字，大有好处”，傅雷还有进一步反思，“我也后悔不早开始记生字的苦功。否则这部书的生字至多只有二三百”。当然，如果“只有二三百”生字，傅雷也会逐一摘抄、记诵的，因为他明确表态，“我虽到了这年纪，身体挺坏，这种苦功还是愿意下的”。傅雷的这段表态，引人深思。傅雷早年留法，归国后一直从事法国文学经典翻译工作，未曾生疏法语，但是，仍然时有功力不济之叹，不能不进行补课、复习。可见，大翻译家维持自己的外语水平，也非易事。

与傅雷一样，晚年的周一良先生也未停止细琐的语言学习。1970年代末，周先生曾通读《例解日语辞典》两遍，“第一遍摘记成语及谚语，第二遍注意拟生词及重叠词，同时摘记用汉字而意义全无关者”。在周先生看来，细琐、繁杂的记诵功夫，实有必要，“华人学日语，尤应特别记忆此中词汇”。如此言论，出现在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的晚年的读书题识，实令人多生感慨。

周一良先生学日语，出自其父的安排，周叔弢老先生认为，日本是中国近邻，日语的作用不容忽视。周一良先生将日语学习坚持下来，对此，他自己也很满意。当然，“坚持”二字，说着容易，落实下来，是需要下很多“苦功”的。

名家治学

□ 岳文典

自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处于马不停蹄的狂奔状态，在科技、理性、文明的旗帜下，人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和辉煌的工业文明，将几乎所有的科学幻想都变成了生活现实。但与此同时，这种以“理性的张扬”为指导的发展模式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危机，人类文明正在经历一个深度转型。

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提出人类面临着两大关键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但遗憾的是，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人类不仅没有实现这两种和解，反而在与自然和人类本身的关系上处于更加紧张的状态，人类对自然和对人类本身仍然展现出一种征服不已的态势。

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建基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资本主义文明以最大限度获取利润为原始动力，这导致其从一开始就存在畸形发展的问题。生产无限扩大与自然资源有限的矛盾无从解决，必然导致资源严重浪费、生态环境恶化的“反文明”效应。于是，生态危机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加拿大作家马克·德·维利耶在《人类的出路》一书中描述道：西方主导的工业化加速发展的200多年里，世界森林消失了一半，湿地减少了1/2，1/3的红树林销声匿迹，90%的掠食鱼类死亡……诸如此类的数据还可以列举很多。

基于此，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其专著《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生态与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并在《生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历程》一文中认为，“如果一种体制倾向于不断的积累和没有限制的消费，那它无疑等于自杀”。全球性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的难题成为洞察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人类文明转型最重要的客观外在动因。

另一方面，人类本身的和解遥遥无期。不仅国际、族际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同时人类又陷入物化、异化的深渊无从解脱，身心的和谐难以达成。长期以来，人类相互间的征服是历史的客观事实，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但尤以今日为甚。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类在两极对立中充斥着暴力、压迫、流血与死亡。就当前来说，这种对立所造成的威胁是空前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征服足以导致整个人类的灭绝，而今天的人类仍然面临这样的威胁。

与此同时，人类在一片欢欣鼓舞中却不自觉地陷入物化、异化的牢笼，并在自我陶醉中日渐沉沦而不自知。高德步先生在《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引用马尔库塞的话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既是“富裕社会”，又是“病态社会”，人们过的是一种“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被异化了的生活。而人的精神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人被异化为物或物的奴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也指出，在近代西方的历史发展中，“经济冲动”和“宗教冲动”构成了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而在当前资本主义时代这两个基因的关系已严重失衡，只剩下经济冲动。也就是说，人的精神世界的支柱已经坍塌。

美国学者艾凯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所做的统计表明丹尼尔·贝尔的结论是正确的。1945—1971年的26年间，美国各阶层、性别、教育水平、职业、年龄不同的人对现代化过程的回答是：越现代化，越不快乐、越不满意。并且“在这同时期，有统计资料表明，美国进入精神病院的人数不断稳定增加”。对此，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形及其特点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而且也表现为人的本质遭受巨大的灾难”。

由此可以看出，由西方国家一路引领的工业文明在经历了长期的狂飙突进之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对外界自然的征服招致了大自然的报复，对人的内在精神的侵入导致了人类身心的失衡，资本主义制度日益走向一个对内缺少改革路径、对外难有替代模式的十字路口。所幸的是，这种困境本身蕴含着人类社会在更大范围向更高形态文明转型的内在要求和潜在动力。于是，革新发展理念成为文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意。

长期以来的发展模式缺乏一种真正意义上对自然的关怀和对人的关怀，它所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自然是一个被征服、被利用、被开发的对象，人是实现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工具。这样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工具理性”至上的发展模式，是遵从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巧取豪夺的发展模式。对此，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在西方其实是相通的，两者难以区分……现代文明的高度超越了人们能够控制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但无论如何，人类社会终究要走向真正的文明而非野蛮，因此，这种发展模式是注定要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而且“现代性的危机必定要由西方资本主义机体之外的文化元素来加以拯救——如果危机真能拯救的话”，叶舒宪在《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一书中做出上述判断。于是，发展理念的革新将不可避免地从西方以外的文化元素吸收营养。在此，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将提供丰富的滋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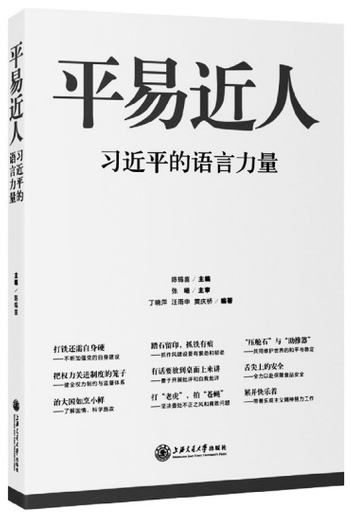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中“有机、连续、整体”的宇宙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态度，“人生意义和人格境界”的理想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将可以为真正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精神家园，恢复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关系，提供重要的价值指导。这既是文明转型的历史必然，也是发展理念革新的大方向。

与发展理念革新『两种和解』

■ 延伸阅读

- 《自然辩证法》（恩格斯）
- 《人类的出路》（马克·德·维利耶）
-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 《生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历程》（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 《西方世界的衰落》（高德步）
-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丹尼尔·贝尔）
-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艾凯）
- 《现代性与大屠杀》（齐格蒙·鲍曼）
- 《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叶舒宪）

书而思



书名：《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
出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